



## 21 世纪的战争

赫弗里德·蒙克勒 (Herfried Münkler) \*

对于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韦茨(Carl von Clausewitz)的《战争论》一书，评论家们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sup>1</sup>。他在该书的一段论述中，把战争描述为“一只真正的变色龙”。它不断调整其形态，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政治条件，并在这些社会条件之下来进行战争。克劳塞韦茨通过区别战争的三个特征，来解释上述这一比喻，即：组成部分在本质上的暴力性、战略家的创新性以及政治决策者的合理性。这三个特征中的第一个，战争“组成部分在本质上的暴力性，即憎恶与仇视，他们是一种盲目的本能”，他把这一点归于大众；排在第二位的是“由可能性和机会组成的游戏——使战争成为一种灵魂的自由活动”，这是一个将军们考虑的问题；最后，“作为一种政治工具的附属本性，战争是理性的”，使战争成为政府的一个工具。<sup>2</sup>在所有这些领域里，社会发展、变动的政治关系、技术进步以及文化变革等，使得社会发生变化，不断以新的姿态出现。同样，战争也永远呈现出新的、不同的形式。在克劳塞韦茨看来，给战争形式带来最深远的影响和最大变化的，是其本质上的武力性、战略创新性以及政治合理性之间的互相依存关系。

### 一、非对称性是新型战争最显著的特征

#### 1. 战略创新性与速决战理论

根据克劳塞韦茨对战争的定义，毛泽东作为游击战理论专家的独特创新之处在于，他发现了一种缓慢的方式，即通过放慢战争进程的速度，为武装抵抗力量提供了战胜在军事技术和组织上都优于己方的敌人的机会。这一发现将小规模战争，也就是从前只是被简单地认为是附属于大规模战争的一个战略，提升到具有自身地位的政治军事战略的层次。一个在技术和组织上都更具优越性的军事机构，都倾向于加快战争的进程，因为这是它充分利用其优势的最好方式。这方面的例子有：缪拉(Murat)的机械化部队快速追击、并消灭在战场上被拿破仑击败的敌人；古德里安(Guderian)的坦克部队利用小范围的突破撕开了敌人的正面防线，打通了深入敌后的渠道；以及在第二次海湾战争中，施瓦兹科夫夫(Schwartzkopf)的战斗轰炸机和巡航导弹甚至在地面战争开始之前，就已经使得伊拉克的指挥和补给系统瘫痪。老赫尔穆特·冯·毛奇(Helmuth von Moltke the Elder)在1866年和1870—1871年期间的德国统一战争中，其近乎完美的战略技术至少反映出这一事实：在通过部署军事资源以提升战争速度方面，他比对手要高明的多。同样的，在过去的20年中美国军队在对其所有潜在的敌人进行的行动中，都取得了显著的优势，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得益于拥有利用各种机会在不同的战斗层面来加速战争进程的能力。

有人认为，战争的发展通常遵循速决战的原则，而且在任何冲突中，胜利将属于那些拥有更大加速战争进程的潜能并能有效利用这一潜能的一方。对此观点可能存在有不同看法，但法

---

\* HERFRIED MÜNKLER, 德国柏林洪堡德大学(Humboldt University, Berlin, Germany) 政治理论教授。他近期出版

了一本关于新型战争的专著：Die neuen Kriege, Rowohlt, Reinbek bei 汉堡, 2002 年。

<sup>1</sup> 这一规律的一个例外是 Andreas Herberg-Rothe, Das Rätsel Clausewitz : Politische Theorie im Widerstreit, Munich, 2001 年, 第 98 页。

<sup>2</sup> 卡尔·冯·克劳塞韦茨(Carl von Clausewitz), *Vom Kriege*, 第 19 版., Werner Hahlweg, 波恩, 1980 年, 第 212 页。

国速决战理论家保罗·维瑞利奥 (Paul Virilio) 及其追随者<sup>3</sup>支持这一看法。不过克劳塞韦茨 (Clausewitz) 关于“变色龙”的比喻，则提醒人们：战争的历史并不总是仅仅遵循这样一种通常基于技术进步的演变模式，它还要受那些更为复杂的因素的影响。速决战是要付出代价的：首先它需要不断增加后勤方面的费用，并相应地要求在部队总数中降低战斗部队的比例，大幅增加开支以便能投入使用现代武器装备部队，而且最终将导致军事系统越来越脆弱且易于出现问题。<sup>4</sup>

毛泽东的创造性就在于，他拒绝加入到敌对行动中追求快速的竞赛当中，否则他的农民军队可能无法赢得那场战争。相反，他否定速决战理论的同时，化弱点为优势，把缓慢奉为他的格言，把游击战定义为“持久战”。<sup>5</sup>此外，游击战略还包括采取任何可能的方法使敌人为速决战真正付出代价，直至战争最终无法支撑下去。莱蒙德·阿龙 (Raymond Aron) 把这种情形浓缩为这样一个方程式：游击队员如果没有被击败，他们就赢得了整个战争；而他们的敌人若没能取胜，就失去了整个战争。<sup>6</sup>两方面各有着不同的时间框架。在越战中，美国人以沉痛的代价懂得了这种公式是多么的有效。非对称战争是近些年来新型战争最显著的特征，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速度，即参战各方分别以不同的速度发动战争：实力的非对称性建立在以超过敌人的速度实施速决战的能力基础之上。而劣势的非对称性，则建立在准备程度和放慢战争速度的能力基础之上。通常这种战略会导致己方伤亡人数大量增加。对称性战争则与之相反，如十八、十九、甚至二十世纪的战争所展示的那样，它可以被定义为由参战方以相同速度发动的战争。在对称性战争中，速决战通常是通过很小的优势就可以决定战争输与赢的结果。

## 2. 先进武器与落后武器

如果从通过减缓战争速度在这个加速发展的时代中的战略重要性这一角度看，21 世纪的战争几乎不可能是 20 世纪战争趋势的线形延续。单凭更充足的物质资源和更先进的技术发展将不会轻而易举地改变战争的胜负。美国在军事技术上的强大优势，也不能保障它在将要发动的每一场战争中都赢得胜利。建立在法治、政治参与以及“后英雄主义”道德观（英雄式的战争与生命的牺牲不再被奉为理想）基础之上的西方社会，它们尽管经济高度发展却也别无选择，如果要想在军事上应付挑战，就必须加快军备技术发展。

西方的民主社会不可能发起毛泽东式的持久战。因为他们准备交换而非牺牲，这也正是“后英雄主义”社会与“英雄主义”时代的区别所在。在“后英雄主义”时代的战争中，人们尽量避免或减少己方损失，而这只有靠更强的军事技术才能实现。例如 1991 年海湾战争中，美国为首的联军只损失 140 人，而伊拉克则损失近 10 万人。更让人惊讶的例子是科索沃战争中，它第一次创造了战胜方零伤亡的历史。由此可见，21 世纪的军备竞赛将不再像 19 世纪和 20 世纪那样的对称发展。在那时，德英两国还竞相生产军舰，美、俄两国则竞相发展核发射系统。相反，军备竞赛将转为高科技与低科技武器之间不对称的竞争。自 9·11 事件以来，我们已经意识到，即使一把切纸盒子的小刀，如果用来劫持飞机使其撞向建筑或城市的话，也可以从根基上动摇一个大国。这样来看，并不单单是减慢战势就可以让恐怖分子袭击美国了，而是需要速度与缓慢的结合。秘密行动的一伙人提前勘探好被袭击地的基础设施的机构，他们悄悄地为袭击作准

<sup>3</sup> 参见维瑞利奥 (Virilio), *La vitesse de libération*, 巴黎 1995 年。

<sup>4</sup> 原子弹的效能强于任何组织严密而合理的现代军队，在此基础上，马丁·冯·克雷菲尔德 (Martin van Creveld) 在他进行了详细讨论的《战争的变化》(The Transformation of War, Simon & Schuster Inc) 一书中认为，未来战争将不再由传统的军队来进行。该书 1991 年在纽约出版，1998 年在德国出版。

<sup>5</sup> 详细内容参见赫弗里德·蒙克勒 (Herfried Münkler), *Über den Krieg : Stationen der Kriegsgeschichte im Spiegel ihrer theoretischen Reflexion*, Weilerswist, 2003 年，第 173 页。

<sup>6</sup> 莱蒙德·阿伦 (Raymond Aron), *Der permanente Krieg*, Frankfurt/M, 1953 年第 48 页。

备，最后将飞机变为火箭，将燃油变成炸弹，实施爆炸。穆罕默德·阿塔 (Mohammed Atta) 及其同谋将自己的速度，也就是从空运的集中到利用向全世界第一时间报道 2001 年 9·11 事件的传媒系统来作为武器，对美国进行了袭击。

### 3. 武力的构成要件

单单的战略创新性当然不能独立地展示克劳塞维茨 (Clausewitz) 的战争三元论中其他两个元素，即：战争的真正武力性与上层决策者的政治理性。如游击战中那样的武力呈低下水平的原则，只适合于那些对广大民众来说、除了发动战争没有任何其他方法来解决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的国家。战争将带来严重的损失和大规模的破坏，但也只有这时人们才会给予游击队后勤支持，拒绝与敌人合作，并源源不断地为战争输送年轻的兵源。否则，游击队战士就不能如鱼得水般在人民中间穿梭，就会失去他们地利、人和的优势，就会落入敌人手中。很长时间内，这种前提条件束缚了游击战这种非对称战略的适用性。直到 19 世纪早期以后，人们才开始了解上面所介绍的这一战争形式，它原则上只能用来防守，而且要求广大民众也一定要做好重大牺牲的准备。

国际恐怖主义的最新形式真正具有威胁力的一面，在于他们发现了敌人的民用基础设施能有效地替代自己的民众及其作出牺牲的准备，从而克服了非对称性战术这一长期以来都被证明有效的策略适用的束缚，用克劳塞维茨 (Clausewitz) 的话来说就是仇恨与敌对，以及把战争作为政治工具所带来的限制。<sup>7</sup>

此外，现今的趋势也表明，不少人将在 21 世纪中发动战争并赢得战争来作为自己未来的唯一希望。所有类似下面的情况，像缺水、沙漠化以海平面上升等这样越来越严重的环境危机，在消费品、受教育机会及生活条件等方面的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人口增长的不均衡及相应的移民大潮，国际金融市场的不稳定以及国家不断下降的控制本国的货币和经济的能力，以及在一些地区，国家的迅速分裂等，都提供了充分的理由来推断：许多人将更看好通过武力来改变未来、而非通过和平发展来保障他们的未来。这样，用武力来保障一个更好的未来将成为那些国家最主要的政治原则，他们不仅准备好争夺重要资源，也将同比他们强大的对手展开非对称的战争。

### 4. 发达国家的脆弱性

正是由于社会经济高度发展，这些强大对手自己才那样脆弱。不管军事上多么超强，他们始终无法消灭自己的弱点。美国为建立导弹防御系统所做的各种计划，目的就在于使自己不那么脆弱。这些导弹防御系统当然不再是针对苏联了，而是针对那些虽然小又弱、但同时拥有核武器以及一些发射系统、并对美国造成了严重威胁的敌人。然而，美国在这些计划里所寄予的希望，在 9·11 事件后彻底破灭了。从原则上讲，战争不仅在政治上，也在经济上不再吸引发达国家了，因为支出远远大于回报。在“后英雄主义”的社会里，人的生命的保存才是最高的价值观所在，与此相联系还有个人幸福感的增强与扩大。

二战结束后，西方社会为了防御而尽力加强其军事装备。所以，加强军事装备的目的不是准备战争，而是避免战争。如果整个社会政治世界只由这样的国家组成，那么肯特 (Kant) 的永久和平理念就会早就实现。<sup>8</sup>然而，这一理念要求所有社会都遵循一套政治大众化，社会个人

<sup>7</sup> 参见：赫弗里德·蒙克勒 (Herfried Münkler), *Die neuen Kriege*, Reinbek bei Hamburg, 2002, 第 175 页。

<sup>8</sup> 克劳斯·约根·甘茨尔 (Klaus-Jürgen Gantzel) 在证明其观点时提到，一旦资本主义模式在世界范围内被采用，作为掠夺物质和服务手段的战争将会消失。“Kriegsursachen :Tendenzen und Perspektiven”, *Ethik und Sozialwissenschaft*, 1997 年, 第 13 期, 第 257—266 页。

化以及价值多元化的西方模式。但正是为了反对这一模式，各种原教旨主义运动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他们决不仅仅是保卫过去留下的传统，而且极度反对遵从西方路线的现代化。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就决定了的社会政治发展的这种双重性，在 21 世纪也同样至关重要。社会发展要靠交流与合作这一事实，是基于宗教、文化以及文明当中，拥有广泛的特殊性而来的。那么除了为争取建立经济资源、受教育机会与生存必需品重新分配的新规则而斗争外，为保护自己在文化上的传统特点也将成为战争的一个原因。需要强调的是，对于和平持乐观态度的发展理论经常容易忽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至少通过近几十年社会经济的发展可以看出，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战争与武力的基础上，看到了对经济发展有利的新的机遇。

## 二、战争的私有化和商业化

### 1. 战争利益的历史透视

然而，战争是如何再次成为赚钱的行当呢？对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回顾一下历史，事实上战争并非总是赔钱的买卖。相反，在欧洲历史的不同时期，如果条件具备，组建私人军队是十分有利可图的。若非如此，我们将无法解释雇佣军在历史上出现的原因，如我们所熟悉的意大利的贡多铁里(condottieri) 雇佣军，瑞士的莱士劳费(Reisläufer) 雇佣军，德国的朗士克内希特(Landsknechte) 雇佣军等。可以推断，他们一定都将战争视为一种谋生手段。正如古语说的那样：以战养战。14 世纪和 15 世纪的意大利是滋养这一现象的沃土。意大利的商业城市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这也使他们成为武装攻击的目标。但是，城市的上层阶级却不愿意亲自参加战争。农村地区充斥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他们可以从事军队工作。因而，对于那些贵族来说，也就没有什么比签订一份雇佣的格式合同更便利的了。这些雇佣军人也就是我们所称的雇佣军。城市上层阶级雇佣农村下层阶级为他们战斗，而后者不久就发现这份工作潜在的机会和力量为他们开辟了一条致富之路。参加战争可以获得丰厚的报酬。几年时间里，许多白手起家的人都过上了舒适的生活。而一大批原本地位卑微的贵族在加入雇佣军后，又都被提拔为公爵或诸侯。

在中世纪晚期和现代历史的早期，由军阀发动的商业化战争的一个典型的特点是：只要有可能，发动者都竭力避免大的战事，即使是决定性的战斗，他们也会选择回避，因为进行大规模的战斗将有损于他们从长期雇佣中获取利益。更重要的是，他们还要冒上生命危险。这些人以从事战争为生，却并不愿为此而死去，他们的行为与态度似乎并不协调。贡多帝里雇佣军（意大利）在展开行动时，都试图切断对方的供给线，以便迫使对手不战而降。与相互残杀比较起来，这种方式的吸引力要大的多。此外，被俘获的敌方军官或士兵的赎金也是一笔可观收入。如果收到赎金，被捕的敌人就得到释放，战争又卷土重来。

通常深受此种战争之苦的是那些城市以及聘用雇佣兵的贵族。他们一般都达不到自己的目的，却要源源不断的为他们的战争注入资金。为此，他们将这个沉重的负担转嫁到生活在他们的土地上的百姓身上，向他们征集人员并征收战争税。这种行为可以称为以“文明的方式”发动对人民的战争，也就是说，如果军阀和他们的士兵能获得稳定的收入，在他们控制范围内的居民就免于受难。但是，如果收入不能如期而至，事情就立即发生变化，军阀会转而以“野蛮的方式”发动对人民的战争，换句话说，他们会强取豪夺，烧杀奸淫，无恶不作的目的就在于告诫所有的当事人，与这种极端的征集方式相比，按时交纳钱财要好得多。

到 16 和 17 世纪，不断增加的军费开支使得战争对于私人来说已经难以负担，现代历史早期的军阀也逐渐淡出历史舞台。最后一个伟大的军阀，阿尔布雷希特·冯·瓦伦斯坦(Albrecht von Wallenstein)，也曾经显赫一时，却终因政治原因，也难逃其失败的厄运。

## 2. 国内战争及其私有程度的降低

发动战争所需经费的稳步上升主要由三个原因导致：第一，炮兵队伍的发展。炮兵在战斗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二，将普通步兵训练成为纪律严明并具有作战经验的步兵团。他们已经逐步配备轻武器而且在与敌军的长线作战中能坚守岗位；第三，军队规模的扩大。扩军的目的就在于促使步兵、骑兵、炮兵三军能够联合展开行动，以取得战争的胜利。现代历史早期兴起的“军事革命”<sup>9</sup>带来了技术和组织上的革新，依照对称性的原则，任何没能跟上这个发展的一方，都被迅速的抛到后面，逐渐从发动战争的行列中消失。然而，步兵团、炮兵团和扩大军队都需要资金来维持，不久人们就发现，唯有国家才有能力支付这笔巨大的费用。如今，一支装备齐全的炮兵部队所需的资源，已经远远超出了私人军事资助人所能承受的范围。军队的规模，三军协同作战而进行的必要演习，特别是对步兵的长期日常训练，都使得军队供给的花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因此，对于私人来说，发动战争已经变得越来越没有吸引力了。战争及其发动战争的准备工作，都渐渐由私人按时提供资金的状态、逐步转由国家来支持的形式。

国家主导下的战争，带来的第一个后果通常缩短交战的时间，参战双方都希望战争会有决定性的迅速的结果。设计产生这样一个结果的战争本身就是实现这一结果的途径。换句话说，发动战争的目的就在于结束战争，实现和平。尽管由于这样使得在欧洲的战场上的武力使用变得更加猛烈，但与此同时，使用武力的时间和空间都被作了明确的限制。此类战争只发生在士兵之间，平民被尽可能的从武力攻击和破坏的目标中分离出去，除非他们不幸地居住在军队行进的道路或是身处战场，他们将不是军事打击的对象。正是在这一发展的基础之上，现代国际法上才出现了对战斗员和非战斗员的明确区分。如果没有这一进步，就不可能有区分原则的出现和应用。

武器技术和军事组织的进步，使战争与和平逐渐取得了各自明确的法律地位，战争与和平这两者之间的转变也由特定的法律行为来标志，如“宣战”或签订“和平条约”。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也与一国之内的战争区别开来，分别属于两种不同的战争形式，前者受条约制约，而后者则不受此限。此外，1899年和1907年《海牙陆战法规惯例公约》及1864年的《日内瓦公约》的相关条款，都对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战斗员和非战斗员作了明确区分，并要求交战国采取一切措施尽可能的使非战斗员免受敌对行动的影响。

## 3. 新型战争中私有化的回归

新型战争里的方方面面几乎都存在对立。其中大部分战争都不是在装备精良的军队之间展开，交战的兵团大多由匆忙招募的部族首领或部落头目和军阀的武装人员以及诸如此类的人员拼凑而成。其中，最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新型战争中使用的武器十分廉价，包括轻武器，自动莱福枪，杀伤性地雷，装置于载人卡车上的机关枪等。重武器的使用极为罕见，即使有、也主要是冷战军备的残余装备。这种类型的战争能被发动，甚至能取胜，主要原因就在于，战争的胜负并非由两支军队在战场上决定，而是由于被拖入针对平民的无休无止的攻击来决定。在对称性冲突的前提下，仅仅为战争作准备——更不用说发动——就已经昂贵不堪了。在新型战争中，战略家们成功的以低成本发动直接战争，从而使战争重新成为一个欣欣向荣的产业。

显然，这并不意味着整个社会为战争所付出的代价同样是低廉的。事实恰恰相反，内战将带来长期的可怕后果，如：基础设施遭受破坏，家园变成了废墟，道路和田间处处隐埋着地雷，

---

<sup>9</sup> 参见杰弗里·帕克尔（Geoffrey Parker），《军事革命：军事创新和西方的崛起》（The Military Revolution : Military Innov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West），剑桥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500-1800页。

以及除了战火和暴力以外没有任何东西的孩子们年轻一代，等等。<sup>10</sup>然而，这些沉痛的代价却并非由战争的主导者们承担。借用一句老话来说，军阀和武装团体的头目们，以骇人听闻的手段将他们发动的战争带来的利益收入囊中，却让整个国家来承担战争的代价。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未能在国家建设中取得成功，与上述现象也有密切的联系。这些所谓的“失败国家”内部，不存在有效机制来制止战争的后果向全国蔓延，他们甚至无法将该战争控制在本国范围之内。由于有武装支持者的拥护，整个国家的人员和自然资源都在这些军政首脑的控制之下。军阀大肆宣扬武力，“尚武”的观念在社会中根深蒂固，拯救这些国家的唯一方法，就是外界力量的介入。但是，这些介入力量能否真正给这些国家带去和平，抑或是将自己卷入敌对和冲突，一直是个公开的问题。在介入和可能存在的反介入过程中，这两种结果是会相互转化的。发生在安哥拉、刚果、索马里、阿富汗以及高加索地区的等一系列事件，都强烈地警示着这一危险的存在。

对获得利益的行为和公开使用武力的区分，是从战争国家化的过程中发展而来的，它是任何建立在和平基础之上的平稳经济存在的先决条件。但是，从对上两个世纪中数目不断增加的新型战争的观察来看，在大部分的战争中，这一区分都被侵蚀并逐渐消失。对新型战争中那些拥有武器、并打算使用武器的人来说，军队是一种收入资源，或是获得物资的手段，或是富裕起来的途径。因此，古老的公理又重新归来：以战养战。根据这个古老的规则，新型战争的一个典型现象就是：军队首领派驻武装部队控制一片领地，以便开发土地之上的自然资源，它从石油、矿产到贵金属和宝石等，都包括在内。或者，他们为这些物资的开发颁发执照，以此获利。与此同时，雇佣兵大规模增加，这些雇佣劳动力为获得丰厚的报酬而为战争服务。与之相伴的还有儿童兵的大量使用，他们被作为一种经济又高效的战争工具。孩子们对危险无所畏惧，对敌手野蛮而残忍；对于不得不与他们交战的国际维和部队来说，儿童兵是战斗中十分棘手的问题；用药品和食物就足以确保他们的服从。所有这些，都使得战争中使用儿童兵成为了武装部队首领青睐的战争手段。从另一方面来说，大部分的第三世界国家都为贫穷和危机所困扰，许多人的温饱缺乏保障，甚至不得不靠抢夺来满足基本的需要。为了生存，很多孩子只能随时准备为武装部队效力。据联合国的统计，全世界有 30 万儿童兵，年龄大都介于 8—14 岁之间，他们永久性的加入了战争一方，以其名义携带武器并使用武力。

被称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分裂，不仅导致了战争由私人提供资助并继而为这些人的私利服务，使得战争重新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行当，而且、主要还有，它能因为战争的爆发使国内的经济可以毫无困难的步入全球市场的资金和商品的浪潮中。除了开发石油和诸如矿产、黄金和宝石等战略性原材料以外，武装部队还非法的使用这些物资或者走私违禁品，借此为战争提供资金并从中积累大笔财富。由于富裕国家的巨大需求，贩毒与倒卖年轻妇女对他们同样有着巨额的利润可图。战争的获利性死灰复燃，对此，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国家也难辞其咎。

新型战争的出现，有两个因素在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即：全球化带来的资金和商品的流动为他们提供了经济支持。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发动战争的成本降低了。东、西方花费了 40 年来准备的战争，目的正是为了阻止其发生。这场战争是一个耗费巨大的敌对过程。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场无休无止的军备竞赛的代价便是导致了其中一方、也就是苏联的解体。然而，正当和平与冲突的研究机构仍忙于重组并计算东西方间军备竞赛的对称性时，新型战争的策划者和战略家们早已成功的从螺旋式的军备竞争中脱身出来，并打破了发动对称性战争所需准备的束缚。这一过程，如上文所述，为战争的私人化和商业化开辟了道路。如果从长远来看，它较之于东西方冲突会显得更加重要和关键。但直至今日，它仍未受到多少关注。

<sup>10</sup> 参见：安·荣格（Anne Jung）（ed.），*Ungeheuer ist nur das Normale: Zur Ökonomie der „neuen“ Kriege, medico international*, Frankfurt/M., 2002; 麦茨·贝达尔（Mats Berdal）、戴维·马罗内（David M. Malone）主编，《贪心与不满：国内战争中的经济考虑》，琳·列纳（Lynne Rienner）出版社，伦敦，2000年；法朗斯瓦·让（François Jean）、让-克里斯多夫·吕芬（Jean-Christophe Rufin）（主编），*经济与国内战争*，巴黎，1996年。

这些新型战争不可能永远只局限于目前已经受其影响的地区。例如，发生在中美和南美、苏哈拉地区、非洲及中南亚等地区的战争，都会通过各种渠道渗透到北半球的繁荣地区。南半球地区属于无法用传统军事手段能加以进行攻击的地区。也正因为如此，才在简短的前言中提到克劳斯威茨(Clausewitz)所说的关于战争就像一条变色龙的比喻。战争不断变幻、以适应当前的社会政治状况，它唯一不变的特性就是暴力。9·11事件折射出一些新型战争的理念，并显示出战争的逐步非军事化将最终会达到怎样的一个程度。

### 三、战争的非军事化

战争的非军事化意味着 21 世纪的战争将只是部分的由士兵参加，而且在大部分的情况下不再仅仅是针对军事目标。在 16 世纪和 17 世纪，战争的国家化结束了战争的混乱状态，取而代之的是战争在受到纪律约束的军事组织间进行，如今，我们发现战争又回归到了其原有的形式。在许多地方，民用目标已取代军事目标成为攻击的对象：从城镇和乡村遭受武装部队占领和掠夺，一直到 9·11 事件中政治和经济有影响力的目标等，都成了恐怖主义组织攻击的目标。甚至其攻击的手段也越来越不具有军事意义上的属性。例如，在非洲和中亚的一些地区，民用的交通工具、丰田大卡车也已经变成了武装团体和武装部队首领的标志。同样，9·11 恐怖袭击之所以发生，也正是因为它将民用设施变成了攻击武器。

9·11 袭击、尤其是发生在以色列的一系列的恐怖爆炸事件警示人们，一种全新的、特别的威胁已经出现：攻击人员把他们自己的身体变成武器，从而将武力的成功使用与他们的死亡相连在一起。只有放弃所有的逃生机会，这种攻击才有实现的可能。换句话说，自杀性爆炸的实施者以放弃任何的求生机会为代价，来弥补他们在军事上的劣势。<sup>11</sup>我们可以罗列大堆的理由从道义上谴责这种行为，但我们也无法否认，一种新形式的“英雄主义”已经产生。对于“后英雄主义”的西方社会来说，这种新“英雄主义”的极度危险性，不仅仅反映在其使用的手段上，更体现于其表象之下所传达的思想。新形式的恐怖主义活动不仅用鲜血证明被攻击社会的脆弱性，还为他们传递了一条更深层次的信息：正因为这些社会致力于保护生命，所以他们最终将被那些准备牺牲自己的人们所击败。建立在自我组织原则基础之上的社会对这种生命的牺牲，持否定态度或者仅仅只是隐喻的地使用，自杀性行为则表达了对这些所谓文明社会的蔑视。<sup>12</sup>恐怖主义活动的战略家们认识到：有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自信心的“后英雄主义”社会，在那些坚持为事业而献身价值观的个人进行的攻击面前，十分脆弱。这是对克劳斯威茨所说的关于战略的创造性是如同“变色龙”最基本特征的又一个例证。

#### 1. 非对称性战略

从出于战略需要、反对通过使战争不断升级的而存在的军事机制，到感到自杀对于建立在内部变革基础上的社会是一种威胁时为止，战争一直处在不断的变化中。而战争行为最新的变化几乎都以非对称性战略为其特点。因此，可以预计 21 世纪的战争将会具有明显的非对称性。这点与 17 世纪以来欧洲历史上所谓的经典战役则与之完全相反，它们几乎都具有对称性的特

---

<sup>11</sup> 对所谓的自杀性爆炸所有新旧方式的深入研究，请参见：克里斯托夫·瑞特(Christoph Reuter)，*Mein Leben ist eine Waffe : Selbstmordattentäter – Psychogramm eines Phänomens*, Munich, 2001年。

<sup>12</sup> 参见：赫弗里德·蒙克勒(Herfried Münkler)、卡斯顿·菲歇尔(Karsten Fischer)，“‘没有任何东西可被屠杀或为之牺牲’ – Überlegungen zu einer politischen Theorie des Opfers”，in：Leviathan 28, 2000, Vol. 3, pp. 343-362，以及赫弗瑞德·姆克勒，“Terrorismus als Kommunikationsstrategie : Die Botschaft des 11 September”，国际政治，56, 2001年,12期，第 11-18页。

点。为了在交互使用武力时达到对称，必须满足多个条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有关各方承认彼此间力量相当。然而，只有当敌对双方分享同一个对他们均有约束力的价值体系（如中世纪武士制度）或者受到法律制度（如国际法，战争法）的普遍约束时，这种承认才有可能。此外，这种对称还建立在平等的假设之上。要达到平等就需要满足一些条件，其中包括：武器装备大致相同，信息上不存在战略性差异，招募和训练战斗员的方法类似。在这些基础之上，限制武力的使用才有可能。例如，只有在平等主体之间才允许使用武力的原则，即在使用武力前，必须首先确认大家均为战斗人员。任何不能满足该平等条件的人都将被排除在武力攻击的范围之外。适用这一点的前提是，非战斗人员被禁止使用武力。依据这些原则，就能将武力限于一定的地域之内，或是战场、或是前线。可以这么说，对称性战争的特征表现为对武力使用的限制。而非对称性战争中，武力则表现出扩散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的趋势。<sup>13</sup>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形，是因为在非对称性战争中，弱势的一方利用公众作为掩护，并以此为基础，发起对强势军事体制的攻击。这一过程是以游击战为开始，又以到当前正在进行的国际恐怖主义行为攻击为终点。

## 2. 跨国战争

欧洲现代历史上对称性战争的主要特点，就是战争的国际性质。当战争成为国家的才拥有的权利，并使得战争以后只在国家与国家之间进行时，这就使得对称性战争所要求的平等和相互承认具有体制上的保障。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欧洲东部的歼灭战以及对城市居住区的战略性轰炸，致使建立在平等基础上对使用武力的限制最终被打破。这时，国家开始划定边界，区分内部与外部事务，区分朋友与敌人，战争与和平，军事与政治，忠实与虚伪，等等。许多年来，相关的文化都普遍认可并使用“内部战争”或“国内战争”一词作为国际战争或国家间战争的反义词。虽然如此，该反义词仍依存于国家体系的范围，在该体系中，该词的词义与国家所划定的边界有关联。“国内战争”一词与“国际战争”意思相反，而反义词则为“跨国战争”。而在跨国战争中，国家划定的边界就不再起作用。这种类型的战争跨越国家边界，它甚至不需要像国家间战争那样发动，例如，发生在安哥拉及其周边地区以及刚果、索马里和阿富汗地区的战争。跨国战争的特征表现为时而为友、时而为敌的不断反复，以及负责维持社会秩序并依靠强制力来实施的国家机器（如军队和警察）的崩溃。在这种情况下，战争行为与犯罪行为变得难以区分，战争也陷入泥潭，看不到伴随其结束而到来的和平前景。早在 20 世纪 80 和 90 年代，这类战争就大量发生。它们与恐怖主义、游击战一道，决定着 21 世纪全球许多地区的武力进程。

## 结束语

是否存在任何方法能阻止、或至少是减缓上面所提到的各种战争趋势呢？要有效的抑制战争的私有化、不断膨胀的非对称性战略以及战争的非军事化倾向，在全球范围内回归稳定的主权国家状态或许是唯一有效的途径。也就是说，通过先前的基础，坚持主张自治权，并将其融入到政治军事的战略当中。主权国家的概念属于政治理性，但却与政治的发展趋势相矛盾。<sup>14</sup>然

---

<sup>13</sup> 关于这一区别的详细探讨，请参见：玛丽·卡尔朵（Mary Kaldor），*Neue und alte Kriege : Organisierte Gewalt im Zeitalter der Globalisierung*, Frankfurt/M., 2000 年。

<sup>14</sup> 有关该问题的深入研究，请参看：赫弗里德·蒙克勒（Herfried Münkler），“Die Kriege der Zukunft und die Zukunft der Staaten” in Wolfgang Knöbl/Gunnar Schmidt (eds), *Die Gegenwart des Krieges : Staatliche Gewalt in der Moderne*, Frankfurt/M., 2000 年，第 52-71 页。



而，将国家主权纳入全球化趋势的观点这认为，任何在世界范围内复兴政治的国家化的观念都是值得怀疑的。这一途径要取得成功最重要的就在于，国家的精英们能抵制腐败，并且能在国家中掌握权力。但是，根据对近期发展的观察来看，这一点同样前景黯淡。由此可见，21世纪的战争在大多数情况下，将不会出现大规模的火力和军事能力的较量，而是将继续以没有明显开始或结束的方式潜伏进行。与此同时，发动战争方与国际有组织犯罪之间的分界线也变得越来越模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一些人也开始怀疑：这些情势是否已经构成了战争。<sup>15</sup>但他们忽视了这样一个现实，即在欧洲，早在战争成为国家的特权之前，雇佣军和强盗就已经结成了亲密同盟。这样看来，有着变色龙特性的战争在21世纪更会不断变换面目，在许多方面将类似于14世纪至17世纪期间爆发的各种形式的战争。

## 文章摘要

在本书中，作者发掘并揭示了21世纪“新型战争”的显著特点，并对其中三类特殊现象进行了剖析：战争的非对称性、非军事化以及私有化和商业化。

作者首先强调指出，卷入新型冲突的各方之间的非对称性，是目前正在进行的战争区别于发生在上个世纪的战争的一个显著特征。作者通过应用速决战理论展开分析：在冲突中，掌握先进技术的一方可能试图凭借其技术上的优势快速取得胜利；而技术处于弱势的一方，则会采取“游击”战术，用尽一切办法使敌方为速决战付出代价。由于种种原因，在这种非对称性冲突中，掌握先进技术一方并不必然占据上风。

其次，许多“新型战争”已经体现出非军事化的特点。之所以得出这一结论，是由于参加战斗的人员并非仅仅局限于士兵，而且攻击也不再主要直接针对军事目标。事实上，这一变化也再次折射出非对称性战争所带来的影响。在破坏性或跨国性的武装冲突中，人道规则适用的混乱，伴随并强调了这一趋势。

冲突中日益增强的私有化和商业化是新型战争的第三个特征。2001年发生的9.11事件警示人类，卷入武装冲突的各方可能扩展到跨国犯罪组织或跨国恐怖组织。由此导致发生在各国与这些类型的国际势力之间的冲突的私有化趋势进一步加强。与此同时，从战争中牟利并通过支持冲突而获益的“军阀”，在21世纪的新型战争中也开始“重焕生机”。在此基础上，作者回顾了战争商业化的历史及发展进程。

综观全文，作者认为，以上特点将继续影响近期发生的许多战争。这些趋势将难以改变，除非回归稳定的主权国家状态，战争的私有化和非军事化趋势才有可能得到有效遏制。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进行中的全球化进程将会有利于财富和实力的分配趋于平衡，进而从根本上削弱非对称性冲突产生的根源。

翻译：吴芳 校对：朱文奇

---

<sup>15</sup> 例如：艾哈德·艾普勒（Erhard Eppler），Vom Gewaltmonopol zum Gewaltmarkt: Die Privatisierung und Kommerzialisierung der Gewalt, Frankfurt/M., 2002年。